

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困境

曾向红 陈明霞

内容提要 在国家承认需求的驱动下,国际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承认斗争现象。通过对国家承认斗争结果的探究,可以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承认斗争的结果是陷入承认困境,而非实现相互承认。即遭遇蔑视的行为体为追求承认而开展承认斗争,但结果依然无法获得蔑视主体的承认。国家的承认斗争之所以会陷入承认困境,在体系层面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有关,在单元层面与国家的身份优越感有关,前者提升了承认困境出现的可能性,后者直接推动了承认困境的出现。哈萨克斯坦与美国之间的承认互动可对承认困境的出现及形成逻辑提供直观的经验事实展示。对于承认困境的探讨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与承认斗争研究,在现实层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家之间的互动何以容易陷入话语攻讦、外交争端甚至国家间冲突的状态之中。当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承认困境的成分,承认斗争与承认困境或许可以为理解当下的中美竞争、把握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趋势提供一个有益的新视角。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承认困境 承认与蔑视 承认斗争 地位结构 身份优越感

* 曾向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730000);陈明霞: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730000)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1VQG010)的阶段性成果,且得到2022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大国中亚政策调整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编号:2022jbkyjd001)的资助。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维护安全与增加财富是否穷尽了一国的行为动机？换言之，理性主义范式是否可以充分解释国家之间的所有紧张、纷争、冲突甚至战争现象？^① 对此，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承认理论学者指出，无政府状态中国家生存的含义应该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生存(physical survival)即确保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与完整，以及社会生存(social survival)即建立和维持稳定的身份。^② 一国身份的建立和维持有赖于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承认。所以，除了捍卫以安全和财富为核心的物质利益之外，获得承认亦构成国家的重要行为动机。至于承认在国际政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或者说承认具有多大程度的重要性，承认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一方面，从承认与和平和合作之间的关系来看，承认即使不足以保证和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合作，^③但却是处于危机中的双边关系走向和平的第一步；^④另一方面，从承认与冲突和战争之间的关系来看，给予承认的确不足以化解和制止国际冲突与战争，但承认缺位却使得国际冲突与战争变得更加可能^⑤——较为激烈的观点认为，国家发起或加入战争是为了获得身份承认而不是捍卫物质利益(有时甚至以牺牲物质利益为代价)，温和一些的观点则认为，国家之间的承认缺位使得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变得不太可能。^⑥

因此，承认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获取承认构成国家的重要行为动机。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遭遇蔑视的行为体将针对蔑视主体开展承认斗争以争取蔑视主体的承认。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国家的承认需求已存在基本共识，且对国际社会中的承认斗争现象也有所关注。但不论从经验事实来看，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承认斗争皆非承认研究的终点。承认斗争的后续研究存在一定的空间，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本文正是着眼于此，尝试探讨国家

①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 26.

② 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8.

③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 36.

④ Karl Gustafsson, "Recognising Recognition through Thick and Thin: Insights from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1, No.3, 2016, p. 267.

⑤ 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0, p. 25.

⑥ Freedman Joshua, "The Recognition Dilemma: Negotiating Identity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5, No.1, 2021, p. 125.

承认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① 首先,国家承认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做出的回答是: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承认斗争的结果是陷入承认困境,而非实现相互承认。至于承认斗争的结果为何是承认困境而非相互承认,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上寻找答案:国际体系层次的地位分配限制了相互承认的可能性;国家层次的身份优越感导向了承认困境。具体来看,作为一项理论阐发型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承认斗争结果是什么及为什么,即承认困境及其成因的问题进行学理性探讨,然后借助哈萨克斯坦与美国之间的承认互动这一案例对前文的理论发现进行经验事实佐证,最后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尝试探索面临承认困境行为体的应对策略。

一、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困境

(一) 有关承认的假定及概念澄清

要探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需首先做出一个假定——国家如同个人,^②亦有承认需求。承认需求与承认斗争的逻辑不仅是个人层面的现象,而且也存在于国家及国际关系层面。^③ 虽然,与个人的承认需求相比,国家的承认需求在国家决策过程中并不总是占据十分明显的重要性,但这只是因为遭遇蔑视的国家不如遭遇蔑视的个人那般反应强烈,而不是因为国家不存在承认需求。之所以遭遇蔑视的国家不如遭遇蔑视的个人那般反应强烈,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相对于是否获得他者的承认,国家一般情况下更关心和重视物质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二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拥有主权承认的合法行为体,主权承认的获

^① 关于承认斗争结果的问题,温特从宏观层面论证了个人和国家的承认斗争(加上技术发展的助推和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引导)的最终结果是推动世界国家的出现。不同于温特的研究路径,本文试图关注承认斗争的微观、具体层面,即一国针对他国开展承认斗争的普遍性结果是什么、这一结果是如何出现的。参见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9, No.4, 2003, pp. 491-542。

^② 国家的人格化/拟人化假定,即将国家定义为类似于“人”的“行为体”,指赋予国家以人的属性,如理性、身份、利益、信仰等。这一假定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虽然学者们在“人的哪些属性可以被赋予国家、为国家赋予人的属性是否是一件好事”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也都普遍认定,国家的人格化/拟人化假定是有意义的,有助于构建理论。参见 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2, 2004, pp. 289-291。

^③ 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pp. 37-38。

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对社会承认的依赖。^①

以此假定为前提,要探究承认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需进一步澄清承认及相关概念的指涉与表述。就承认的概念来看,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教授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一书中,将承认概念的哲学起源,由费希特和黑格尔进一步向前推到卢梭和萨特的“自恋”概念范畴(承认指涉主体所追求的东西,即在社会框架中获得价值评判),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同情”概念范畴(承认指涉主体出于动机性的自然本性而追求的东西,即成为社会共同体所接纳的成员),及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尊重”概念范畴(承认指涉主体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理性的、自我规定的存在而设定的条件)。^②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承认意味着被视为法治共同体中的独立主体,希望得到承认就是希望他者将自我视为独立的主体。^③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菲利普·内尔(Philip Nel)对承认概念做出更为清晰的界定:“承认指一种主体间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施动者得以成为有自尊、受尊重的社会或国际社会成员,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是构成施动者身份的共同决定因素。”^④ 法国凡尔赛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林德曼(Thomas Lindemann)对承认与蔑视做出更为明确的判断:“若一行为体自我主张的形象与他者形成的关于该行为体的形象之间大致一致,那么,该行为体的形象就得到承认;反之,若他者形成的关于该行为体的形象比该行为体自我主张的形象更消极、负面,那么,该行为体的形象就遭到蔑视”。^⑤

在澄清了承认概念的指涉与表述之后,需进一步依据承认的对象或内容,对国际政治中的承认现象进行大致的分类与限定。大体而言,国际政治中的承认一般涉及主权、资格与身份三种类型。^⑥ 主权承认一般指的是对新兴国家

① Reinhard Wolf, “Prickly States? Recognition and Disrespect between Persons and Peoples,”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p. 39-42.

②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刘心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秦亚青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59页。

④ Philip Nel, “Redis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 What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Wa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6, No.4, 2010, p. 953;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28页。

⑤ Thomas Lindemann,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p. 209-210.

⑥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30页。

或新生政权的外交承认,资格承认则是指对特定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成员资格条件的承认,身份承认就是指对一国“自我认同塑造手段的承认”。^①当然,除主权、资格及身份三类较为普遍的承认现象之外,国际政治中还存在对于一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承认,以及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历史责任的承认等。在上述三类普遍的承认现象之中,主权承认通常只涉及新兴国家或新生政权,资格承认只涉及特定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成员,而身份承认则一般涉及所有的国际行为体。所以,相较而言,在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下,身份承认是最为普遍的国际政治承认现象。因此,下文对承认与承认斗争的讨论都将限定于身份承认。

身份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是自我之所以为自我、自我区别于他者的根本属性。所以,一个国家或非国家组织得以成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根本前提和特征,是其拥有特定的身份。从身份的来源来看,温特认为,一方面,身份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另一方面,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又往往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现与该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二者之间的一致,因此,身份在本质上有一种主体间的或体系的特征。概言之,“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的和外在的结构建构而成的”。^②由此,结合上文内尔对承认与身份的论述,可以发现,获得承认是身份得以确立的必要和重要环节。如果一个行为体自己宣称的某种身份无法得到外界社会的承认,那么,这个身份就是无效的。^③

从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来看,国家身份的建构起点及最基本要素是国家的自我理解,即一种内生的、源于国内叙事和历史经验的、代表了国家对自己是谁或者是什么的概念的国家内部属性。^④以国家的自我理解为起点,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为一国的自我理解给予承认,然后,一国的自我理解方可实现向共有理解的转化。简言之,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基本遵循“自我理解——他者承认——共有理解”的逻辑。这便导致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具有不安全感:国家始终面临一种可能,即其有关身份的自我理解无法得到他者的承认。当获得承认时,国家的不安全感将得到缓解,因为其有关身份的自我理解得到了确认,致使其可以依据一个确定的、积极的自我认知来采取行动,并且可以自由

① 赵俊:《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84页。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页。

③ Yana Zuo, “Self-Identification, Recognition, and Conflicts: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Identity, 1949-2008,”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 154.

④ Michelle Murray, “Identity, In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The Tragedy of German Naval Ambitio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19, No.4, 2010, pp. 660-661.

地追求其身份所界定的利益。而当承认缺位时,其不安全感将会进一步加剧,因为其有关身份的自我理解受到质疑,导致其无法依据一个确定的、积极的自我认知来采取行动,更无法不受阻碍地追求其身份所界定的利益。总之,国家身份提供了国家是谁、其在国际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其准备如何行动以实现利益的感觉。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身份,国家就无法定义和认识其利益并确保安全。因此,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其基本动机之一就是实现身份承认。^①

(二) 承认斗争的结果:相互承认还是承认困境?

承认不会自动到来,每个行为体都必须为自己的身份争取他者的承认,^②承认斗争由此得以反复出现。承认斗争是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权利运动的基础。^③ 具体来看,承认斗争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行为体试图获得他者(尤其是“显著性他者”)的承认,以确保其成为社会秩序中特定类型的行为体。^④ 从经验事实来看,承认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占用了国家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并促使国家以特定的方式做出行动和与外国互动。承认斗争是一种普遍的国家行动与互动的逻辑,但却遭到传统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忽视。对国家承认需求与承认斗争逻辑的忽视导致对许多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显得不充分、不全面,甚至不客观、不真实。^⑤

本部分内容将聚焦于国家的承认斗争,尝试回答一个具体问题——国际社会中承认斗争的一般性结果是什么? 要探究国家的承认斗争及结果,其实可以参考黑格尔对于个人的承认斗争及结果(即“主奴关系”的形成与辩证发展)的论述。尽管国内社会中的个人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之间存在某些表面上的差异,但黑格尔关于身份形成的观点并非源于生物学或心理学,而是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探索身份的形成过程。因此,只要国家也寻求在国际社会中确立自己的身份,那么,类似于个人身份形成的行为模式就同样会出现在国家

^① Michelle Murray, "Recognition, Disrespect and the Struggle for Morocco: Rethinking Imperial Germany's Security Dilemma,"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p. 133-135.

^②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7, No.2, 2002, p. 120.

^③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④ Michelle Murray, "Identity, In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The Tragedy of German Naval Ambitio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p. 660.

^⑤ Erik Ringma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 3; Erik Ringmar, "Recogni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Global Discourse*, Vol.4, No.4, 2014, p. 1.

身上。^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国家的身份承认关联到黑格尔“主奴关系”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意识从经验层面进展到知识层面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其中,自我意识在对外物时将消灭外物,并将其纳入到自身之中以确保自身的生命活动,面对其他的自我意识时亦是如此,即自我意识只有在其他的自我意识中才能获得满足。然而,其他的自我意识积极且不甘被消灭并最终将奋起反抗,于是便形成了自我意识之间的生死搏斗状态。斗争结果不外乎三种:双方同归于尽、一方生一方死、一方向另一方投降从而使双方共存,黑格尔认为只有第三种情况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的实现依赖于他者的存在。于是便催生出“主奴关系”:主人是斗争的获胜者,是独立的意识,其本质是自为存在;奴隶是妥协的失败者,是依赖的意识,其本质是为对方而存在。换言之,主人是被承认的自我意识,主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奴隶的承认而建立起来的。^②同时,在“主奴关系”中,主人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联,即奴隶代替主人对物进行加工改造以供主人享受,在这一过程中,主人逐渐依赖于奴隶,最终结果是主人丧失独立的自我意识并形成依赖的自我意识。而在同一过程中,奴隶则由于恐惧(对死和主人的恐惧)和劳动(对物的改造)而逐渐产生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一过程也就是“主奴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主人由独立的自我意识转变为依赖的自我意识,而奴隶则相反,由依赖的自我意识转变为独立的自我意识,在意识层面实现了“主奴关系”的转换。

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在“主奴关系”的形成环节(主人独立意识和奴隶依赖意识的确立),还是在“主奴关系”的辩证发展环节(主人与奴隶独立意识与依赖意识的转换),主人都得到奴隶的承认,奴隶则始终无法成为存在的主宰。即在前一个环节,奴隶的行动就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作的事情在本质上等同于主人的行动;在后一个环节,奴隶作为一个自为存在将自己扬弃,奴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正是主人对奴隶所做的事情。因此,就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承认关系来看,始终缺少一个承认环节,即主人对奴隶所做的事情应该也是主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而奴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应该也是其对主人所做的事情。这就出现一种单方面的、不一致的承认关系。^③黑格尔指出,自

① 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p. 37.

②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122页。

③ 同上书,第123页。

我意识是自在且自为的,但自在自为的原因和前提在于被其他自我意识所承认。^① 所以,自我意识之间应该呈现一种交互式的承认关系,更为确切的说,是自我意识的主动性要求自我意识之间的承认是一种交互式的承认。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交互式的承认呢?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交互式的承认首先始于单方面的承认,即仅一方得到承认,而另一方无法获得承认。^② 单方面的承认关系是通过自为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相互排斥、对立和斗争过程实现的,即获胜方得到了失败方的承认,但失败方并未得到获胜方同等的承认。这时存在两个不同的自我意识:获胜方自为的自我意识和失败方为他的自我意识,前者是独立的意识,而后者是依赖的意识,前者是主人的本质,后者是奴隶的本质。随着“主奴关系”的辩证发展,即随着主人与奴隶自我意识的辩证转换,承认关系也发生转变:当奴隶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时,便要求重新获得承认,两个自我意识之间“为承认而斗争”的状态再次出现。斗争的结果将又是“主奴关系”的再次确立,即再次回到单方面的承认状态。换言之,在“主奴关系”中,两个对立的主体由于地位上永远处于不平等,所以,二者之间不可能实现平等的交互式承认。反之,要实现平等的交互式承认,就必须超越“主奴关系”,而超越“主奴关系”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则是实现主体在地位上的平等。

当然,黑格尔的承认及“主奴关系”概念远非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有学者将其类比于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提出所谓的“承认博弈”(The Recognition Game),用于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及国际政治现象(参见表1、2)。国家之间的承认博弈本身属于一种特殊的互动行为,互动的结果将是双方身份的塑造,而无关物质利益的分配。换言之,参与承认博弈的国家,其斗争的目的在于获得对于自己和对方身份的塑造权,即哪一方有权将哪一种身份描述施加给对方。结果将是博弈的获胜者占有“主人、领导者、文明国家”等身份,而失败者则被施加“奴隶、追随者、野蛮国家”等身份。具体来看,在承认博弈的四种可能结果中,双方互相不承认(即蔑视)因而导致战争的结果是最不稳定的承认状态,因为双方都对对方抱有强烈的敌意,且都将有充足的理由针对对方开展承认斗争。典型事例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与韩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南越与北越,由于互相不承认彼此对同一片领土的主权主张而进行的战争。此外,其他两种一方获得承认、另一方遭遇蔑视,导致一方成为“主人”、另一方成为“奴隶”的结果,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因为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18页。

② 同上书,第119—120页。

遭遇蔑视的一方始终拥有进行承认斗争的动机和可能。因此,只有双方互相承认才是双方都满意因而没有动机去打破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和最终的状态。也只有在这一状态下,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与持久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显然,实现这一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在地位上的平等。^①

就国际社会而言,自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无政府状态一直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特征。虽然“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②但这种同等只指涉单元在功能上的同一性,即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始终是同类的单元,同类单元意味着,“每个国家作为一个自主的政治单元与其他国家是平等的,也可称之为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③ 主权国家的功能则主要在于对内维持秩序,对外保卫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同类单元的国家在功能上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在能力上的一致性。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领土、财富、实力等方面千差万别,而在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则主要依据能力的大小来实现彼此的区分,不论是实践家还是理论家,都会对某一时期的大国与其他国家加以明显区分。^④ 换言之,以无政府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社会,其根本属性是各国在实力分配方面的明显不平等。甚至可以说,以主权平等为规范的国际社会事实上存在一个等级结构:国家实力各不相同,各国依实力大小而占据不同的地位,实力更强大的国家在地位上往往居于更高级的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社会并不具备实现平等交互式承认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国家不论实力大小在地位上一律平等。

至此,基本可以对“国际社会中承认斗争的一般性结果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在国际社会中,遭遇蔑视的行为体为获取承认而针对蔑视主体开展承认斗争,但由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在根本上限制了相互承认的可能性,所以,导致遭遇蔑视的行为体依然无法获得承认。即承认斗争的起点是遭遇蔑视,动机和意图是获取承认,但终点依然是被蔑视,这一过程基本可以表述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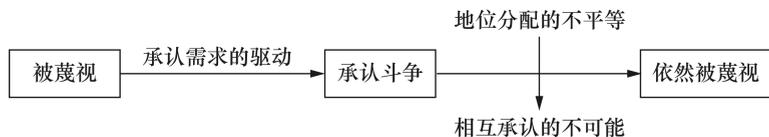


图 承认困境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①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pp. 115-136.
②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③ 同上书,第101页。
④ 同上书,第102—103页。

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被蔑视——承认斗争(以追求承认)——依然被蔑视”的过程类似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内涵,即“不安全——发展军备(以追求安全)——更加不安全”,因此,可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承认困境”(Recognition Dilemma)。^①

关于承认困境,有三点问题需做出说明:其一,正如约翰·赫兹(John H. Herz)所指出的,只要存在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就会自然发生。本文认为,只要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仍然以不平等为特征,遭遇蔑视的行为体就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承认困境;其二,与国内社会相比,国际社会中的承认困境更加明显和普遍,因为国际社会缺乏类似于国内社会中的规范性力量和强制性力量来对个体之间的承认困境进行约束和调节;^②其三,从上述承认博弈的四种结果来看,承认困境属于一种不稳定的承认状态,行为体始终存在改变、推翻现状的动机与可能。也就是说,承认困境并非承认互动的终点,反而极有可能激发起新一轮的承认斗争,直到最终实现承认博弈的稳定状态,即互相承认的状态。

表 1 囚徒困境博弈

	A 国		
B 国		合作	背叛
合作		和平	单边损失(以 A 国为视角)
背叛		单边获益(以 A 国为视角)	战争

资料来源: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7, No.2, 2002, pp. 115-136。

表 2 承认博弈

	A 国		
B 国		被承认	被蔑视
被承认		和平	“主人”(以 A 国为视角)
被蔑视		“奴隶”(以 A 国为视角)	战争

资料来源: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7, No.2, 2002, pp. 115-136。

^① 关于“承认困境”这一概念,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际关系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至少存在两个层次或方向:一个方向旨在强调被蔑视者和蔑视者之间的承认互动——被蔑视者进行承认斗争旨在追求承认,但其承认斗争引起了蔑视者的反感与厌恶等情绪,因而使其遭受了进一步的蔑视。另一个方向旨在强调行为体在追求承认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份张力与矛盾——获得他者的承认是行为体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的基础,但与此同时,追求他者的承认也可能是行为体弱点的来源,即当一行为体授权外部的他者作为掌控其自我身份的权威时,该行为体的身份主张便具有了脆弱性和依赖性。本文对“承认困境”的使用基本遵循前者即承认双方互动的逻辑。关于“承认困境”的两个层次,参见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63—84页;Freedman Joshua, “The Recognition Dilemma: Negotiating Identity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5, No.1, 2021, pp. 122-135。

^② 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第78页。

(三) 承认困境的出现:地位结构与身份优越感

在对“国际社会中承认斗争的一般性结果是什么?”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国际社会中承认斗争的一般性结果是陷入承认困境,而非实现相互承认)之后,仍需回答“国际社会中承认斗争的一般性结果为什么是承认困境而非相互承认?”在回答前一个问题的时候,本文指出,正是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限制了国家之间实现相互承认的可能性。延续这一逻辑,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承认困境的出现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有关。但与此同时,因为承认困境本质上属于一种国家(互动)行为,而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作为一个体系层次的因素,其更多的是提升了国家之间承认困境出现的可能性,而无法直接导向国家之间的承认困境。因此,至少还存在一个单元层次的因素直接推动了国家之间承认困境的出现。联系到承认的对象和内容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涉的是身份,本文将这一单元层次的因素定位为国家身份,更确切的说,是国家的“身份优越感”。国家之间承认困境的出现在体系层面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有关,在单元层面与国家的身份优越感有关,前者提升了承认困境出现的可能性,后者直接推动了承认困境的出现。

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来看,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应由国家间的地位分配来界定,而国家间的地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间的实力分配之间存在正向对应关系,即通常情况下,实力越强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越高。换言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地位分配不是以平等、而是以不平等为根本特征。具体而言,首先,从地位的定义来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黛博拉·拉森(Deborah W. Larson)等学者根据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关于地位的经典社会学定义,提出了关于国家地位的定义,即“关于一个国家有价值的属性(如财富、军事威慑力、文化、人口、社会政治组织,及外交影响力)排名的共有观念”。^①可以发现,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本质上是一种排名,具有明显的等级属性。事实上,正如美国政治科学家、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言,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国内社会的地位等级制逐渐消解,而国际社会却仍然奉行单一的地位等级制。^②国际政治中的主权规范和主权平等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掩盖了有关国家地位的真实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7.

^② Richard Ned Lebow, “Spirit, Recognition, and Foreign Policy: Germany and World War II,”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 101.

属性——国际社会地位结构的根本特征是等级制,而非平等。^①其次,从地位的来源或依据来看,在国际关系中,最明显、最普遍的地位等级是基于实力或权力的等级。换言之,在通常情况下,地位可被看作是权力的反映,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分配可被看作是权力分配的同义词。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是非均质的,相应的,地位分配也是非均等的。因此可以说,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在本质上以等级制为特征,处于该结构中的国家在根本上遵循支配—从属的行为模式。^②总之,尽管当前的国际社会是无政府且主权至上的,但地位结构的等级性却无处不在,体系内几乎所有的关系与互动都以等级为特征,各国平等的表象下隐藏着支配—从属模式的本质。^③

就国家的身份优越感而言,优越感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个体及群体进行抽象竞争的心理活动或状态。因此,优越感源于竞争,暗含比较或对比,核心是经由对比得出的差异,即有和无、好和坏、高和低、快和慢等。由此可见,优越感的出现至少关涉两个行为体,一行为体以自我为主体,以其他(非我)行为体为客体,以超越、即在竞争中胜出其他行为体为优越感。对于优越感的追求人皆有之,正是对优越感的追求激励着行为体向前进步。^④对优越感的追求不仅是人类个体的心理行为,群体亦有类似的心理行为。群体优越感较为典型的体现是产生于殖民时代、服务于西方殖民统治的白人种族主义。其主张欧洲白人属于优越种族,拥有人类所有美德;相反,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则形貌丑陋、道德低下;基于白人和黑人及有色人种之间的对比和差异,认为欧洲白人应该统治和主宰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乃至整个世界。^⑤国家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群体,亦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后殖民时代的现代国家,虽然不再或极少借助种族或民族来构建自身的优越感,但基于文化、制度等的优越感仍是普遍现象。如“我国的文化催生了现代文明,他(非我)国的文化没有产生强大文明”“我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自由民主,他国的政治制度伴随着独裁专制”“我国的经济制度实现了经济繁荣,他国的经济制度导致了经济凋敝”,等等。概言之,“我国的某一属性优于他(非我)国”,这种基于一国文化、制度等的优越感,可被统一视为国家的身份优越感。

霍耐特在追溯当代承认概念起源和历史的时候,指出承认概念在历史上

①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

②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2009, p. 175.

③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 7.

④ [奥]阿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顾天天译,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页。

⑤ 林耀华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存在多个截然不同的表述,首先便是卢梭的“自恋”概念。卢梭被视为现代承认理论的鼻祖,在1755年发表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借助“自恋”概念,指出正是自恋这种激情,促使人们在与同类的相处中追求一种优势、高人一等的地位。但在追求自恋的过程中,个体沉迷于让自己的任何行为都得到他者的承认,即将他者视为判断自我行为的“法官”,从而导致了个体对他者的依赖,最终将出现个体自我丧失的危险。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自恋(承认)的追求导致了等级排序与自我丧失,因此可被视为一种消极的承认理论。在1762年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提出自恋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受到特定社会秩序的影响和塑造,对于自恋的追求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一种平等前提下相互尊重的形式,而不是像前者那样追求优势与高人一等。这一过程中,对于自恋(承认)的追求促进了平等与相互尊重,因此可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承认理论。简言之,在卢梭看来,自恋作为一种伴生于社会化的人类基本需求,其或许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过度的自恋形式和适度的自恋形式。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描绘的是一种过度的自恋形式,即当个体处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中时,其对承认的追求呈现出的是一种想要被价值评判为更高级、更优越的形态。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描绘的是一种适度的自恋形式,即当个体处于共和与平等的社会秩序中时,其对承认的追求呈现出的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形态。^①

结合卢梭关于两种自恋(承认)形式的描述,可以认为,国际社会中的承认基本遵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过度自恋的逻辑。即国家处于一种等级制、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其所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级、更优越而非平等尊重的承认形式。换言之,国际社会地位结构的等级制特征催生了国家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尤其是处于等级排序中靠前的国家。而亦如前文所指出的,优越感的维持和显示依赖于比较与对比得出的差异,若差异消失,优越感亦将消解。同理,一国身份优越感的维系亦有赖于自我和他者身份对比的差异。即只有当他国是“野蛮”“落后”“专制”等“不好”的,该国“文明”“先进”“民主”等“好”的国家的身份优越感才能得以维持和显示;若他国亦是“文明”“先进”“民主”的,那么,该国的身份优越感将不复存在。因此,正是出于对身份优越感的维护,一国对他国承认斗争的回应方式将是身份蔑视(确保身份对比的差异),而非身份承认(身份差异将因此消失),前者将使该国陷入承认困境,后者将实现双方的相互承认。

综上,国家之间承认困境的出现在体系层面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有关,在单元层面与国家的身份优越感有关,前者提升了承认困境出现的可能性,后

^①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第23—37页。

者直接推动了承认困境的出现。具体而言,国际社会地位结构的等级秩序催生了国家的身份优越感,对于身份优越感的维护推动了一国对他国的身份蔑视,从而致使他国的承认斗争陷入承认困境。换言之,互动双方要达到相互承认的结果,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实现实力对等、消除他者的自我优越感。然而,这两个任务,尤其是后者,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对追求承认的一方而言,这意味着它即便实现了实力的极大增强,但因他者才是是否赋予其所追求的承认的决定方,故追求承认的后果终究不由追求承认的一方所能决定,由此导致其承认诉求始终处于一种依赖于他者承认的脆弱地位。由此可推论:承认困境中存在的上述逻辑,预示着承认困境本质上的无解,即国家的承认斗争在本质上将陷入一种“死循环”,即“被蔑视——承认斗争——依然被蔑视——承认斗争——……”。下文将以哈萨克斯坦与美国的承认互动为例,对承认斗争的结果及承认困境的出现进行经验事实展示。

二、哈萨克斯坦与美国承认互动中的承认困境

国际社会中的承认斗争与承认困境现象并不少见,之所以选择哈萨克斯坦与美国之间的承认互动作为案例,原因有二:其一,哈萨克斯坦与美国的承认互动兼具典型性与代表性——典型性在于双方的蔑视与反抗互动间隔十多年却几乎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发生;代表性在于美国的蔑视手段在他国身上多次出现,哈萨克斯坦的反抗手段亦在他国身上多次出现;其二,哈萨克斯坦面临的承认困境兼具明显性与隐蔽性——明显性在于美国对于哈萨克斯坦身份蔑视的公开与直白;隐蔽性在于美国对哈萨克斯坦身份蔑视的形式主要是公众叙事而非官方叙事。因此,以哈萨克斯坦与美国之间的承认互动为案例,来对本文提出的理论发现进行经验事实展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一) 哈萨克斯坦对承认的渴望与追求

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获得独立。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进入国际社会视野的五国,此前并无建构现代主权国家的经历和经验,因而对于国家建设和身份建构存在普遍的期待和焦虑。为推动国家发展尽快步入正轨,1992年5月16日,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哈萨克斯坦作为主权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战略》,全面构想并论述了哈萨克斯坦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目标。具体包括:政治方面,将哈萨克斯坦建设成为政治安全、主权完

整、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现代主权国家,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增强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分量;经济方面,建立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确立独特的地位;国家安全与对外关系方面,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与地区合作、参与国际事务,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适当的国际地位。^①不难看出,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便相当重视其国际形象的维护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因此,一旦国际社会对其国际形象和地位给出了其所预期的正向反馈,哈萨克斯坦就会表现出极大程度的重视。如哈萨克斯坦于2002年被美国和欧盟认证为市场经济体制、2005年被世界银行归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被哈萨克斯坦视为国际社会对其在达到某些基准方面的成就的接纳和认可。因而,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官方演讲和讲话中,这些反馈曾多次被提及和称许。^②由此可见,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十分渴望并重视来自国际社会的正向反馈——承认。

哈萨克斯坦渴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为成为一个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一致的现代文明国家,哈萨克斯坦主动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积极与美欧接触并开展合作。就对西方核心价值观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哈萨克斯坦广泛接受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市场经济、民主选举、分权制衡、重视人权等价值体系。^③就融入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和措施来看,哈萨克斯坦积极引进英语实施“三语政策”、参与全球体育赛事如2006年组建阿斯塔纳职业自行车队、创办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机构如2010年创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融入国际金融网络如2017年建造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等。^④就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核问题来看,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从苏

① 崔丽芝:《哈萨克斯坦作为主权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战略》,《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2年第24期,第1—4页。

② Thomas Ambrosio and William A. Lange, “Mapping Kazakhstan’s Geopolitical Code: An Analysis of Nazarbayev’s Presidential Addresses, 1997-2014,”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55, No.5, 2014, p. 553.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Kazakhstan Hold Subcommittee on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and the Human Rights Dialogue,” November, 2018,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54272/eu-and-kazakhstan-hold-subcommittee-justice-and-home-affairs-and-human-rights-dialogue_en, 2021-04-12;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Kazakhstan Hold Annual Human Rights Dialogue and Subcommittee on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November,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89522/eu-and-kazakhstan-hold-annual-human-rights-dialogue-and-subcommittee-justice-and-home-affairs_en, 2021-04-12.

④ 哈萨克斯坦总统府:《新世界中的新哈萨克斯坦》,2007年2月28日, https://www.akorda.kz/ru/addresses/addresses_of_president/poslanie-prezidenta-respubliki-kazahstan-nazarbaeva-narodu-kazahstana-28-fevralya-2007-g, 2021-04-12; Adrien Fauve, “Global Astana: Nation Branding as A Legitimization Tool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4, No.1, 2015, pp. 110-124.

联继承了规模巨大的战略武器,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第四核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自愿放弃并坚决配合美国弃核,移除境内的全部核武器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创了和平发展及核裁军的有效模式。此后,纳扎尔巴耶夫还曾在多个场合向全世界发出维护国际安全、放弃核武器的呼吁,同时表明哈萨克斯坦在倡议无核化、防止核武器扩散以及禁止核武器试验等问题上的坚定立场。^①就发展与欧洲的关系来看,自1995年与欧盟签署合作协定以来,哈萨克斯坦便开始逐步靠近欧盟,双方在教育、能源、交通、关贸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多样化的合作,^②此外,哈萨克斯坦还加入欧安组织并积极申办欧安组织主席国,制定《通往欧洲之路》专项计划等。

不论是在核武器问题上积极坚定配合美国弃核、还是主动发展与欧盟的联系与合作、抑或是广泛接受美欧所倡导的西方价值体系,哈萨克斯坦的上述举措背后虽然不乏物质利益导向的实用主义考虑,但同时也可被理解为,作为新独立的新生国家,哈萨克斯坦为了成为及被国际社会认为一个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并无二致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努力。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上述每一项举措都存在可供选择的替代性方案:在核问题上大可坚决拥核成为核大国、在对外关系上可选择与非西方国家发展合作、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亦不乏其他选项,如此说来,哈萨克斯坦之所以选择前者而非后者,是因为前者更符合欧美西方国家所定义和刻画现代文明国家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哈萨克斯坦想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所承认的现代文明国家,并为此付出了实际行动上的努力。^③

(二) 美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蔑视

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论是在强制性权力(compulsory

① 《哈萨克斯坦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5周年》,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19年2月15日, https://www.inform.kz/cn/25_a3498568, 2021-04-14;《外媒:哈萨克斯坦在东亚地区宣传核不扩散》,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16年11月10日, 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2968264, 2021-04-14。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November, 2016,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14232/european-union-and-republic-kazakhstan-partnership-and-cooperation-agreement_en, 2021-04-14; "Enhanced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Vol.69, February, 2016,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enhanced_partnership_and_cooperation_agreement.pdf, 2021-04-14; European Commission, "Kazakhstan and the EU," October,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1367/kazakhstan-and-eu_en, 2021-04-14。

③ Anna Matveeva, "Legitimising Central Asian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Symbolic Power," *Europe-Asia Studies*, Vol.61, No.7, 2009, p. 1117.

power)、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还是在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①方面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美国也经常利用这种权力优势来处理国际事务与对外关系。如依靠强制性权力军事介入他国事务,通过制度性权力操纵国际机制以约束和限制他国行为,凭借结构性权力在他国领土驻军并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借助生产性权力界定所谓“文明”“落后”“西方”“非西方”等概念,或创造诸如“干涉的权力”(the right to intervene)“保护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等话语以塑造他国认知和行为。^②事实上,考虑到成本收益问题,相比其他权力手段,生产性权力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与对外关系过程中更频繁使用的权力手段。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美国的官方叙事和公众叙事经常对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形象进行扭曲呈现,以此来保持、增加和显示美国的权力。^③

就官方叙事来看,美国国会曾对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贴上“独裁者”“集权者”标签。然而,哈萨克斯坦自建国之初便搭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民主选举、多党制度、三权分立等因素一应俱全,同时,纳扎尔巴耶夫及“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的长期执政亦符合哈国内选举制度的程序正义。所以,针对美国政府的“独裁者”标签,哈萨克斯坦官方表达了“强烈不满”。^④就公众叙事来看,美国的大众传媒经常利用影视作品夸张、扭曲甚至抹黑特定国家或群体。就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国家及人民形象扭曲呈现的影视作品来看,先后于美国制作和上映的两部极具政治讽刺性质的恶搞喜剧电影《波拉特》(*Borat*)、《波拉特 2》(*Borat Subsequent Moviefilm*)是最典型例子。前者又名《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哈萨克斯坦而学习美国文化》(*Cul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 Glo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由英国犹太裔的萨莎·拜伦·科恩(Sacha Baron Cohen)编剧和主演,美国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制作和发行,于 2006 年 11 月最先在美国公映。正如其名所示,该影片用诙谐搞笑的手法,讲述了一位哈萨克斯坦主播波拉特在前往美国学习和考察美国文化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而发生的一系列搞笑故事。后者又名《为建设伟

① 权力的四种分类参见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59, 2005, p. 48。

② 陈小鼎、王亚琪:《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当代亚太》2014 年第 3 期,第 97—119 页。

③ 摩根索认为,全部政治,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其政策所寻求的,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Mariya Y. Omelichev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106-107, 转引自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第 145 页。

大祖国哈萨克斯坦而贿赂美国政权》(*Delivery of Prodigious Bribe to American Regime for Make Benefit Once Glo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 于 2020 年 10 月最先在美国主流媒体平台上映。该影片延续此前的风格, 以极其夸张、荒诞、恶趣味的手法, 讲述了波拉特受哈萨克斯坦总统之命去往美国, 为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送礼贿赂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搞笑故事。

上述两部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哈萨克斯坦国家形象是是相当不真实、甚至扭曲的: 包括电影主人公在内的哈萨克斯坦民众无知、粗鄙、反犹、男权/父权主义; 哈萨克斯坦总统独裁、集权、残暴、不人道; 哈萨克斯坦社会则野蛮、落后、迷信、性别不平等。显然, 不论是民众、总统, 还是整个社会, 影片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特征与真实的哈萨克斯坦是不相符甚至严重背离的, 也与哈萨克斯坦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国家的身份和形象更是完全背道而驰。事实上, 根据前文对承认与蔑视的界定, 上述这种哈萨克斯坦自己主张的国家形象与美国官方及公众叙事中所呈现出的哈国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根本上属于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国家身份的蔑视。

(三) 哈萨克斯坦针对美国的承认斗争

如前所述, 从思想和观念层面来看, 哈萨克斯坦对于获得国际社会有关其形象、身份和地位的承认有着强烈的渴望。从对内和对外行为来看, 哈萨克斯坦为了成为、并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承认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而付出了诸多实际行动上的努力。从结果来看, 经过 30 年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 哈萨克斯坦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政治安全还是社会稳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综合国力及发达程度居中亚五国之首。^① 尽管如此, 哈萨克斯坦的渴望、努力与所取得的成果并未能助其实现预期的承认, 相反, 美国依然对其国家形象进行了包括官方叙事和公众叙事在内的扭曲呈现, 是对其现代文明国家这一国家身份构成蔑视。

一国想要获得他国的承认, 尤其是“显著性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承

^① 依据美国权威排名机构“美国新闻”(U. S. News)发布的 2020 国家实力排名, 哈萨克斯坦国家实力远超其他中亚四国, 排行世界第 36 位, 其他四国则位于第 73 位之后, 参见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power-rankings>, 2021-04-19。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20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 2020》(*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在 1990—2019 年间人类发展指数趋势(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rends, 1990-2019)排名中, 哈萨克斯坦处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 排行全球第 51 位; 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处于“高人类发展水平”(High human development), 分别排名第 106 位、111 位;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则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Medium human development), 分别排名第 120 位、125 位。参见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dr2020pdf.pdf>, 2021-04-19。

认,在获取承认这一动机的驱使下,遭遇蔑视的行为体将针对蔑视主体开展承认斗争。对哈萨克斯坦而言,美国显然构成其“显著性他者”之一。^①首先,美国处于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与地位排序的顶端,影响甚至决定着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其次,美国自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早早开始介入中亚事务,至今已发展成为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②与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文等领域皆有所关联。所以,将美国视为哈萨克斯坦的“显著性他者”是符合逻辑和事实合理性的。此外,近代以来,美国依靠强大的科技取得了经济和军事奇迹,借助民主自由理念实现了政治和文化繁荣,因此也往往被视为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标杆和样板。换言之,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美国既构成“显著性他者”,又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榜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有着模仿美国行为的惯性,即美国是否给予承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承认行为。^③基于上述原因,哈萨克斯坦有充分理由期待获得美国对于其所重视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一国家身份的承认。然而,美国却频频通过官方叙事和公众叙事对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形象进行扭曲呈现,构成对其国家身份的蔑视,因此引发了哈萨克斯坦针对美国的承认斗争,斗争策略主要表现为话语抗议。^④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针对美国官方叙事中对哈萨克斯坦国家身份的蔑视行为,如对哈总统贴“独裁者”标签,哈萨克斯坦政府以话语抗议的形式表达了官方的不满和愤懑。对于美国公众叙事中对哈萨克斯坦身份的蔑视行为——在影视作品中恶搞、扭曲哈萨克斯坦民众、总统和社会的形象,哈萨克斯坦官方和民众皆采取话语抗议的斗争策略向美国开展承认斗争。从官方层面来看,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抗争主要围绕两条路径展开:其一,针对影片本身及其主创人员进行批判和控诉;其二,对于影片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反击,即借助美国媒体平台,对哈萨克斯坦形象进行积极正面宣传,来纠正影片所塑造的哈萨克斯坦的负面形象。就第一条路径来看,在《波拉特》于2006年上映后,哈萨克斯坦国内便对其采取了封禁措施,哈外交部也批评其庸俗、无品味、不符合文明世界的伦理规范与行为标准。对于该影片的主创兼主演科恩,哈外交部

① 笔者尝试对“显著性他者”进行衡量和限定,对于一行为体而言,其显著性他者应该是:(1)体系中权力和地位排序极高的行为体;(2)与该行为体互动频率极高的行为体(既包括正面互动如合作,也包括负面互动如冲突)。

② 中、美、俄是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大国,但各自的影响力分布程度不一、侧重不同。具体参见朱永彪、魏丽娟:《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评析》,《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5期,第73—107页。

③ 游启明:《崛起国为什么修正国际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3期,第81页。

④ 有关被蔑视行为体开展承认斗争时的策略选择,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第130—131页。

批评其是受命于某些政治命令有意贬损哈萨克斯坦及其人民,并威胁将对其提起诉讼。^①就第二条路径来看,为消除该影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哈萨克斯坦政府斥巨资在美国各大媒体平台如《外交》杂志、《财富》周刊、《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及华盛顿地方电视台等投放广告,目的是向世界宣传哈萨克斯坦的正面形象,如哈萨克斯坦在国内和地区实施宽容的政策、哈国内能源生产稳定、哈是美国在反恐方面的朋友和伙伴、哈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②

从民众层面来看,在《波拉特》上映后,哈萨克斯坦民众对其表现出普遍的愤怒、厌恶与抗拒,因为这是他们国家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但却是以一种极其不体面和令人作呕的方式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这对于广大哈萨克人尤其是哈萨克民族主义者来说有伤自尊。^③然而,尽管面临着来自哈萨克斯坦官方和民间的普遍不满与抗议,在时隔14年后,《波拉特》的制作团队依然于2020年推出了《波拉特2》,继续扭曲呈现哈萨克斯坦民众、总统及社会的形象。与第一部上映后的情况类似,哈萨克斯坦再度对《波拉特2》表示不满。就民众的反应来看,电影甫一上映,一些哈萨克斯坦年轻人便来到美国驻阿拉木图总领馆门前进行抗议,要求禁止上映影片,呼吁美国官方对影片制作方采取严厉措施、并向哈萨克人民道歉。^④此外,美国哈萨克裔协会表态称该电影煽动了对一个极为弱势且发声不足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暴力。^⑤对于民众的负面态度,哈萨克斯坦官方亦进行了回应,哈外交部表示对电影中出现的挑衅、嘲笑哈萨克斯坦人民及其国家形象的情节感到愤怒,并表态称,该电影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想,国内民众理应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攻击感到

① Joel Stein, "Kazakhstan, Reversing Itself, Embraces 'Borat' as Very Ni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6/business/kazakhstan-embraces-borat.html>, 2021-05-01; Edward Schatz, "Transnational Image Making and Soft Authoritarian Kazakhstan," *Slavic Review*, Vol.67, No.1, 2008, p. 56; Robert A. Saunder, "Buying into Brand Borat: Kazakhstan's Cautious Embrace of Its Unwanted 'Son'?" *Slavic Review*, Vol.67, No.1, 2008, pp. 69-70.

② Robert A. Saunder, "Buying into Brand Borat: Kazakhstan's Cautious Embrace of Its Unwanted 'Son'?" pp. 69-73.

③ Yerlan Askarbekov, "What Kazakhstan Really Thought of Borat," October 29, 2016, <https://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161028-what-kazakhstan-really-thought-of-borat>, 2022-12-10; Donnacha Ó Beachá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ceptions of the Borat Phenomenon in Kazakhstan: Evidence from a Case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 Vol.3, No.3, 2011, pp. 59-60.

④ Samuel Spencer, "'Borat 2': Kazakhs Launch Petition to Cancel 'Racist' Movie,"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newsweek.com/borat-2-subsequent-moviefilm-kazakhstan-racist-amazon-prime-video-1542094>, 2021-05-13.

⑤ Andrew Pulver, "Kazakh-American Group Claims Borat Subsequent Moviefilm 'Incites Violence',"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0/oct/27/kazakh-american-group-claims-borat-subsequent-moviefilm-incites-violence>, 2021-05-13.

愤怒。^①

(四) 哈萨克斯坦的承认困境

2006年,《波拉特》影片因恶搞、扭曲哈萨克斯坦国家形象而引发了哈萨克斯坦针对美国的承认斗争。然而,不论是哈萨克斯坦官方层面的外交抗议、形象纠偏,抑或是民众所表达出的群体愤怒与抗拒,都未能实现预期的改变——哈萨克斯坦既未收到来自电影主创方的道歉表态,也未能在根本上改变外界受众基于该影片对哈萨克斯坦所形成的既有认知。^②反而是哈萨克斯坦自己做出让步和妥协,如承认电影主创科恩享有言论自由、邀请其访问哈萨克斯坦、感谢科恩及其所创造的电影为哈萨克斯坦向全世界做了旅游广告并使外界对哈有更多的了解。^③事实上,2020年,《波拉特2》的上映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哈萨克斯坦此前所开展的承认斗争的彻底失败——电影主创及美英两国忽略甚至无视了哈萨克斯坦的承认斗争即官方的外交抗议和民众的愤怒情绪,在第二部影片中继续扭曲呈现哈萨克斯坦民众、总统及社会的形象。毫无疑问,《波拉特2》的上映依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哈萨克群体的普遍不满,但对于来自哈萨克斯坦政府和民众的反对和抗议之声,美国官方的表态却值得玩味。如美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在一份正式声明中回应表示,美国政府从未参与电影的融资、制作或发行,民众享有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政府有支持公民和平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很显然,美国方面的回应所释放出的态度和信息是,美国并未正视或重视哈萨克斯坦对于身份遭遇蔑视的抗议和希望获得承认的诉求。哈萨克斯坦针对美国的承认斗争并未获得美国的承认,反而陷入了承认困境。^④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Kazakhstan Responds to Outrage of Kazakhstanis over Borat 2 Movie,”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for.kg/news-673998-en.html#comments>, 2021-05-13.

② Jami Fullerton, et al., “Brand Borat? Americans Reaction to a Kazakhstani Place Branding Campaign,”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4, No.2, 2008, pp. 164-168.

③ Joel Stein, “Kazakhstan, Reversing Itself, Embraces ‘Borat’ as Very Ni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6/business/kazakhstan-embraces-borat.html>, 2021-05-15.

④ 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开展研究,本文遵从“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假定。虽然美国的政府与媒体界有时“共振”,有时又“相互攻讦”,但在本文的案例中,双方的立场基本保持一致。具体来看,《波拉特》作为一个美国的媒体作品,其先是引发了哈萨克斯坦政府和民众的反对与抗议,而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针对哈方的抗议进行表态。也就是说,围绕美国的一部媒体作品,美、哈两国产生了官方互动。此外,从美方的表态来看,并未就哈方的关切做出任何积极回应,且隐含立场是对美国媒体界的支持和维护。因此,即使最初美国的媒体作品(涉及对哈萨克斯坦的身份蔑视)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但这部作品引发了美、哈两国的官方互动,而且从两国的官方互动来看,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在此问题上基本保持立场一致。

哈萨克斯坦所面临的承认困境在体系层次上与当前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有关,在单元层次上与美国的身份优越感有关。当前国际社会地位分配的典型特征是不平等,在这样一种等级制的秩序中,国家所追求的是一种优越而非平等的身份承认,这种对于身份优越感的追求更加明显的体现在地位排序中靠前的国家身上。换言之,处于国际地位排序顶端的美国,其始终追求一种身份优越感,这种身份优越感的来源则是与其他国家身份对比所形成的差异,如美国是民主、自由、开放、先进、文明、高人权……的国家,相对地,其他国家则是专制、压迫、封闭、落后、野蛮、低人权……的国家。若这种对比的差异消失,基于这种差异的优越感也就不复存在。若美国给与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民主、自由……国家身份的承认,那么,美国自身基于民主、自由……国家的身份优越感将无法维系。因此,在与哈萨克斯坦的承认互动中,为了维护美国自身及其所代表的整个西方世界的身份优越感,其对哈萨克斯坦承认斗争的回应方式是拒绝承认,即拒绝承认哈萨克斯坦是和美国一样的现代文明国家。

事实上,不止是哈萨克斯坦,诸如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与美国的承认互动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类似的承认困境。美国对于中俄等国的身份蔑视在本质上与中俄等国的特定表现和行为无关,而与美国特定的身份优越感有关,这种身份优越感的根基在于美国与中俄等国在具体方面的差异。如蔑视(即拒绝或不承认)中国的人权表现,以维持美国自身“高人权”国家的身份优越感;蔑视俄罗斯独裁专制,以彰显美国“民主”国家的身份优越感,等等。由此可以说,承认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对于哈萨克斯坦等普遍面临承认困境的国家而言,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找到应对承认困境的策略,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哈萨克斯坦应对承认困境的启示

因为国家之间承认困境的出现在体系层面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有关,在单元层面与国家的身份优越感有关,处于承认困境中的国家既无力改变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也无法消解他国的身份优越感,所以,从根本上来看,国家无法走出承认困境。那么,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处于承认困境中的国家是否真的无法走出承认困境?或者说,处于承认困境中的国家可以采取哪些特定行为来应对承认困境?

有学者指出,若一国关于其身份叙事的承认需求遭到拒绝,其一般存在三

种可能的行为选择。^① 首先,最直接、最明显的选择便是放弃:放弃自我叙事,接受蔑视主体的叙事。即哈萨克斯坦放弃现代文明国家的身份主张,接受美国关于其落后、独裁、野蛮的国家形象和身份叙事。显然,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行为体关于身份的自我叙事天然地想要被承认、被尊重。因此,放弃自我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选择。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坚持并改造:坚持自我叙事,同时进行自我改造,以求最终获得承认。即哈萨克斯坦坚持现代文明国家的身份主张,但更重要的是认真考虑美国的叙事,并按照美国的先进、民主、文明等标准,改革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以获得美国的承认。这看似是一种具有一定操作性的可行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污名化”的色彩,其叙事依据并非真实、客观,而是有意识的扭曲、贬抑、侮辱。^② 所以,哈萨克斯坦的自我改造并不必然能换来美国的承认。第三种选择是坚持并反抗:坚持自我叙事,并开展承认斗争,以暴力手段迫使蔑视主体改变其态度和行为。很显然,哈萨克斯坦并不具备以暴力手段开展承认斗争来矫正美国态度和行为的能力,且亦如前文所述,非暴力的承认斗争最终遭到美国的忽视和无视,致使哈萨克斯坦陷入承认困境。由此可见,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上述三种选择基本不具备可能性或可行性。

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理论或还可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根据社会身份理论,黛博拉·拉森等学者指出,国家在追求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三种身份管理策略(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③ 其一是社会流动,即低地位国家学习和模仿高地位国家的行为方式,接受和遵从高地位国家的制度规范、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以获得高地位国家的认可和接纳。社会流动策略是非西方国家融入、试图融入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主要途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的中东欧国家等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二是社会竞争,与社会流动的逻辑基本相反,社会竞争策略的逻辑起点是,低地位国家对现存秩序合法性的质疑和稳定性的挑战,以此为起点,低地位国家寻求在某些领域追上或超越高低位国家以提升其国际地位。因为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通常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基础,所以,低地位国家社会竞争策略的直接后果往往是军备竞赛、地缘政治竞争、势力范围争夺等。其三是社会创造,与社会流动和社会竞争不同,社会创造的基本前提是低地位国家承认现存

① Erik Ringma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7-8.

② 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3期,第81页。

③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4, 2010, pp. 70-75.

秩序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低地位国家不会完全放弃自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是寻求为改进、完善当前的国际秩序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即低地位国家通过强调自身的独特性,或在特定领域的优越性来展示其价值和贡献,从而提升其国际地位。社会创造的典型表现是倡导新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等。

对上述三种具体的身份管理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社会竞争策略并不适用于哈萨克斯坦。一方面,因为哈萨克斯坦既无质疑和挑战当前国际秩序的意愿,更无在军事、经济、文化等任何领域追赶和超越美国的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哈萨克斯坦不顾实力差距采取社会竞争策略挑战美国的地位,直接后果将是哈美双方关系的恶化,以及持续的军备竞赛、地缘政治竞争、乃至势力范围争夺,这些后果将直接威胁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安全。

其次,社会流动策略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社会流动策略在本质上与上述坚持加改造策略类似,哈萨克斯坦对美国行为方式的学习和模仿、对其制度规范、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的接受和遵从并不必然能换来美国的承认。因为,一方面,美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蔑视带有某种非真实、非客观的“污名化”色彩;另一方面,从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及冷战后的中东欧等国的身份承认(从非西方国家到西方国家“俱乐部”成员)来看,美国是否对他国给予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强的战略考虑。事实上,美国与他国的承认关系在根本上与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的承认关系是一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际社会得以初步形成,欧洲国家之间基本处于相互承认的状态。这种相互承认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国际法层面的相互承认,即各国共同组成一个国际社会,各国都是平等的社会成员,享有相同的权力和责任;其二是外交层面的承认,即各国之间保持正式的外交联系,遵守共享的外交规范。虽然欧洲国家之间处于相互承认的状态,但这种承认的地理边界仅限于欧洲,欧洲人并未将他们的国际社会带向世界的其他地方,相反,欧洲带给世界其他地区的是以不平等和压迫为典型特征的殖民体系,这种体系使得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之间缺乏相互承认成为世界政治永久的、制度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对非欧洲国家施予的任何承认都不是基于原则和规范,而是出于战略利益考虑的权宜之计。^①

最后,相较而言,社会创造策略或许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一方面,社会创造并不像社会竞争那般需要强盛的物质实力做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创造强调

^① Erik Ringma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8-11.

独特性与差异性,而非单纯的模仿和接受,这有益于强化国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进而增强获得承认的可能性。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其或可采取社会创造策略来追求身份承认,如立足于本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地缘位置,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公共产品,或贡献关于国家建构的新理念、新模式等;又如在特定的领域实现优越和领先的发展地位等。不难看出,社会创造策略对于一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诸如当前的中国、俄罗斯等大国或许可凭借自身的软、硬实力,采用社会创造策略来提升各自国际地位和获取身份承认。但若就哈萨克斯坦而言,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相应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此外,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即使如中俄两国,也在一些特定情境中面临来自美国的身份蔑视和承认困境。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身份管理策略,社会创造相对于社会竞争、社会流动两种策略而言,看似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非承认困境的出路。一方面,社会创造策略以一定的国家实力为依托;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与社会流动策略一样,社会创造策略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即使一国成功实施了社会创造策略,也并不必然能获得他国的身份承认。这是因为,即便互动双方实力趋于一致,但承认方终究掌握了是否给予追求承认一方所期待的承认之最终裁决权。而出于维护其自身优越感,承认方不太可能给予这种承认。由此可见,正如承认困境的生成逻辑所预示的那样,处于承认困境中的国家无论采取何种行为,都无法走出承认困境,承认斗争在本质上将导向一种“死循环”,承认困境在根本上不存在出路。

结 语

承认是国家的普遍需求,在承认需求的驱动下,遭遇蔑视的行为体将针对蔑视主体开展承认斗争。那么,国际社会承认斗争的一般性结果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结果的出现?国际关系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所欠缺,因此,本文试图对国家承认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进行一个尝试性探讨。首先是国家承认斗争的结果是什么的问题?对此,本文认为,一般情况下,国家承认斗争的结果是陷入承认困境,而非实现相互承认。至于承认斗争的结果为何是承认困境而非相互承认,本文认为,国家之间承认困境的出现在体系层面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有关,在单元层面与国家的身份优越感有关,前者提升了承认困境出现的可能性,后者直接推动了承认困境的出现。

本文尝试对一个未受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学理性探讨。

这一现象的表现是,在国际社会中,遭遇蔑视的行为体为获取承认而针对蔑视主体开展承认斗争,但由于国际社会的地位结构在根本上限制了相互承认的可能性,所以导致遭遇蔑视的行为体最终无法获得承认。即承认斗争的起点是遭遇蔑视,动机和意图是获取承认,但终点依然是被蔑视。本文发现、提炼了上述现象,尝试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所谓的“承认困境”,并尝试推理承认困境形成的基本逻辑。从理论层面来看,对于承认困境的关注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与承认斗争研究;就现实层面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回答可能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为何国家之间的互动容易陷入到话语攻讦、外交争端甚至国家间冲突的状态之中。事实上,当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承认困境的成分,承认斗争与承认困境或许可以为理解当下的中美竞争、从而把握当前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新视角。从承认的角度来理解当前的中美竞争,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竞争外在地关乎科技、经济等,但本质上还是关于国际主导权及建立国际秩序之争。^① 这种竞争反应出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承认中国拥有分享国际主导权、构建国际秩序的资格。换言之,中国追求与美国类似的“大国”身份承认,但美国并未给予应有的承认,这引发了中国的承认斗争,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及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而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则是这种竞争加剧的直接后果。

本文可能的局限在于,首先,与本文的研究类型密切相关,作为一项理论阐发型研究,本文的研究任务在于,就某一现象提出一个理论发现,然后选取案例对理论发现进行经验事实展示,案例的功能在于更为直观的展示和说明理论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不同于理论验证型研究,后者的研究任务在于,就某一问题提出因果关系假设,然后选取案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与验证,案例的作用在于检查理论假设的合理性。比较而言,后者一般采用多案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但一是考虑到单一案例足以发挥其功能,二是受限于篇幅,本文采用单一案例而非多案例。其次,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性探索,关于承认斗争结果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或许还存在其他可能的回答,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最后,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相当有限,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做出进一步解释和澄清,如承认困境在大国之间互动的呈现形式及其影响、蔑视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是否严格遵循强权政治和恃强凌弱的逻辑、如何严格区分蔑视与污名化、在承认困境不存在出路的情况下如何维护国家的身份安全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探讨将对承认困境这一命题的研究做出进一步的完善。

^① 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2期,第2页;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54页。